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列丛书



Manufacturing Trust Crisis

制造信任危机

郭晓科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列丛书

本著作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成果，
项目名称：媒体与社会信任危机研究
(项目编号：11YJC860013)

Manufacturing Trust Crisis

制造信任危机

郭晓科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造信任危机 / 郭晓科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5

ISBN 978 - 7 - 5118 - 6377 - 5

I. ①制… II. ①郭… III. ①传播媒介—影响—
社会关系—研究—中国 IV. ①G219.2②C9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5290 号



© 法律出版社·中国

责任编辑/张磊

装帧设计/乔智炜

出版/法律出版社

编辑统筹/法律职业教育出版分社

总发行/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沙磊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1 字数/149 千

版本/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网址/www.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6377 - 5

定价:29.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丛书编委会

主 任 李希光 欧阳宏生

编 委 李希光 欧阳宏生 赵中颢 李 珮

罗小萍 李 韧 蒙晓阳 郭晓科

贺 艳 王 炬 陈笑春 裴永刚

丛 书 主 编 李 珮

丛书副主编 罗小萍 李 韧

总 序

2014年是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二十周年,为总结我院办学经验,醇化学术氛围,提升学术影响力,经过认真筹备和严格筛选,我院从今年起,陆续向社会呈献“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列丛书”。

这套丛书,集中体现了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科的传承和创新。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筹建于1994年,原名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995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在全国法科大学中,最早设立新闻传播学科本科专业。近二十年来,走出了一条与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学科错位发展的特色之路,形成“媒介·法律·社会”三者融合并重的办学特色。

2010年1月,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更名为“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同时提出鲜明的办学指导思想与发展定位:以全球新闻视角打造国内一流新闻传播学科。这是为适应中国国力提升之后全球新闻传播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充分整合国际国内资源,在法制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上拓展建立国际化办学模式,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新闻与传播人才的一次大胆创新。

近年来,学院按照既定发展目标,已取得斐然成绩:2006年,新闻学科成为重庆市新闻传播学类唯一的“十一五”重点学科;2007年,新闻学专业被评为重庆市新闻传播类唯一特色专业;2009年,成功获批重庆市法制新闻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10年,获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010年12月,成为

重庆市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10年,新闻学专业被确立为教育部财政第六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2011年,新闻传播学科成为重庆市“十二五”重点学科。通过部市共建,本学科实验教学硬件投入已达810万元,建成了法制纪录片实验室和电视片制作实验室,拥有重庆高校新闻学类最强的实验教学平台;2012年,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本学科排名并列全国第二十三位、西部第三位、重庆第一位。目前,学院已建设成为重庆市新闻传播学学科特色最明显、学科体系最全面、教学科研能力最雄厚、聚集新闻传播类高层次人才最多、在西部新闻学界有影响力的高级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基地。

目前,在研究方向上,学院结合自身办学思路与教师研究特长,形成了新闻与法治研究、国际新闻研究、影视与新媒体研究、政治传播研究这四个稳定的研究方向,并各自聚集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本套丛书共11部作品,是我院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在新闻与法治研究、国际新闻研究、影视与新媒体研究、政治传播研究这四个研究方向的代表性成果,也是我院新生代学术实力的一次整体亮相。

在本套丛书中:

蒙晓阳教授所著的《新闻侵害人格权研究》,详细阐述了新闻侵害人格权的特殊性及其与重大公共利益的联系,作者期待通过对新闻侵害人格权特殊性的法理阐述,促使维护重大公共利益的基础性法治观念能在新闻侵权立法与司法领域得到更好的落实。

蔡斐副教授所著的《1903年:上海苏报案与清末司法转型》,从上海苏报案这一个案出发,论证了苏报案及清末司法转型发生的必然性,作者认为当1903年、上海、《苏报》等因素聚集在一起时,苏报案的发生成为一种必然,而清末司法转型作为当时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也是一种必然。文章最后从苏报案视角看百年司法改革,对清末司法转型诸多学说在苏报案中的体现进行梳理,并从个案谈论了司法的现代性及百年司法改革。

陈笑春副教授所著的《法律的电视虚构生产——中国当代法律题材电视剧研究》,以一定的电视剧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现实的、客观存在

的法律,包括法律的制度性规定、法律的基本价值、中国法律文化等是如何被作为大众媒介和艺术作品的电视剧表现。

裴永刚副教授所著的《中国出版物版权输出竞争策略研究》,从产业竞争的角度分析版权输出,特别是从出版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输出版权的角度进行探讨,纠正了以往只强调版权产品对外输出而忽视出版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版权输出的问题,试图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版权输出战略竞争体系。

李林容教授所著的《中国电视娱乐文化批评》,试图解答以下问题:在我国当下的媒介文化具体语境下,电视娱乐是如何建构和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在“娱乐为王”的时代,如何打造优质的娱乐产品?电视娱乐化的道德伦理底线在哪里?其合理的内核、价值和边界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对娱乐进行审美救赎?应该塑造和架构一种什么样的娱乐精神、审美精神和“快乐文化”?

郭晓科副教授所著的《制造信任危机》,提出了将媒体看作中介要素的社会信任系统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与媒体要素相连的其它要素分别是影响社会信任的外因和内因。信任是一种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是面对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未来的一种赌博,是否愿意给予信任,最终是由人来决定和展开行动的。因此,人的因素是影响信任的内因;宏观的社会条件,是影响信任的外因。媒体作为一种中介因素,它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正是通过与这些外因和内因的作用实现的。

贺艳副教授所著的《关于“家”的想象与叙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伦理电视剧的叙事文化研究》,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家庭伦理电视剧做文本研究的方式,探讨了以下问题:作为拥有广泛受众的大众传播媒介,电视这一大众传媒通过家庭伦理剧的方式表达着什么样的“家”的意象?“家”这一意象在电视剧文本中是如何被建构的?在“家”形象的建构背后,如何隐藏着各种社会力量的角逐?

郑微波副教授所著的《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史》,提出从三峡工程开工建设以来,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大规模的出现以三峡工程为题材的纪实影像作品。他们的生产传播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传播现象。如果

没有影像参与三峡工程的形象书写,历史的叙述是不完整的。过去的历史写作呈现文字与文献的垄断效应,影像的缺席成为传统历史叙述体系中致命的遗憾。

周松博士所著的《地理影响与文化表征——重庆电视纪录片研究》,选择重庆电视纪录片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媒介地理学的视野和思路,梳理了重庆电视纪录片的历史渊源、萌芽、生成和发展,着力分析地理如何影响重庆电视纪录片创作者、受众以及传播途径,具体阐释了重庆电视纪录片对重庆地理的影像表征的各个方面。

赵文丹讲师所著的《重庆都市报发展史》,对重庆都市报近三十年的历史进行回顾与梳理,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对其进行趋势预测。作者认为,重庆都市报的发展几乎与我国都市报的发展同步,它们共同见证了我国都市报业的兴起、繁荣与挑战。经过近三十年的崛起和发展,重庆都市报尚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且随着重庆直辖市地位的进一步巩固,这种空间将日益彰显。但重庆都市报也和其他省市的都市报一样,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着空前的行业危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危机是由于技术的更新换代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合理变革。

陈丽丹讲师所著的《关注热点:特定议题新闻报道研究》,主要对灾难新闻报道、环境保护中的新闻报道、医患纠纷报道、犯罪新闻报道、国际犯罪报道、网络反腐新闻报道、揭露性报道、女性议题报道、未成年人议题报道、农民工题材报道、大学生议题报道等十多个方面的议题进行研究,并在最后一个专题中对当前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进行反思。

我们真诚期待学术界对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列丛书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是为序。

李珮

二〇一四年一月毓秀园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媒体对信任的影响 / 2

第二节 媒介效果研究的复杂性 / 7

第三节 什么是信任 / 10

一、心理学视角 / 10

二、社会学视角 / 11

三、经济学视角 / 12

四、社会信任的定义 / 14

第四节 媒体接触对信任影响的实证研究 / 18

一、研究假设 / 18

二、研究方法与测量指标 / 20

三、研究发现 / 21

四、研究结论 / 25

第二章 社会信任生成系统 / 27

第一节 系统方法 / 28

一、什么是系统论 / 29

二、什么是系统 / 31

第二节 建立社会信任系统模型 / 34

一、社会信任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 34

二、黑箱理论与灰箱理论 / 36	
三、信任文化的社会生成模型 / 38	
第三节 修正社会信任系统模型 / 41	
一、媒体的中介作用 / 42	
二、修正的系统模型 / 45	
第四节 系统结构的合理性 / 47	
一、媒体与社会 / 47	
二、媒体与受众 / 49	
第三章 媒体与信任外因的关系 / 53	
第一节 “安徽泗县甲肝疫苗”事件综述 / 57	
第二节 信任的外因 / 61	
一、熟悉性是简单信任的基础 / 62	
二、交往媒介是系统信任的支持条件 / 64	
三、导致不信任的外因剖析 / 66	
第三节 媒体再现的框架分析 / 68	
一、新闻框架 / 71	
二、信源和引语的选择 / 72	
三、新闻语言的标签化 / 80	
第四节 媒体对信任的多维度影响 / 81	

一、直接的短期影响 / 82

二、间接的短期影响 / 85

三、直接的长期影响 / 85

四、间接的长期影响 / 88

第五节 小结 / 90

第四章 媒体与信任内因的关系 / 92

第一节 “烤瓷牙致肾病”事件综述 / 93

第二节 信任的内因 / 95

第三节 态度影响的早期理论 / 97

第四节 说服的推敲可能性模式 / 100

一、说服的两条路径 / 100

二、说服的对象 / 103

三、议程设置作用 / 104

四、影响推敲的可能性 / 109

五、媒介因素的多种作用 / 113

六、社会情绪的形成 / 116

第五节 小结 / 119

第五章 信任危机与道德恐慌 / 121

第一节 什么是道德恐慌 / 121

第二节	“艾滋谣言”事件综述 / 124
第三节	我国艾滋病歧视现状 / 128
第四节	类型化与刻板化 / 130
第五节	奇观化与他者化 / 133
第六节	小结 / 140
第六章	媒体在制造信任危机吗 / 142
第一节	媒体的中介作用 / 142
第二节	信任是一种易碎的奢侈品 / 145
参考文献	/ 153
附录：“安徽泗县甲肝疫苗事件”媒体报道样本	/ 160

第一章 绪 论

近年来,我国慈善机构、商业企业乃至政府部门都陷入公信力危机的困境,而“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社会现实,折射出了人际信任的缺失,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问题。

郑也夫对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现状描述如下:社会信任的“最高端是不仅在熟人中建立了信任,而且靠着系统信任在陌生的环境里建立了信任;最低端是不仅在陌生人之间缺乏信任,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丧失。杀熟标志着后一极端,标志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1〕}

媒体常常被形容为社会的“监视器”,媒体为公众建构了对外部环境风险的认知,但如果媒体缺乏专业能力,那么媒体的报道往往会引发公众恐慌,制造信任危机。

例如,2013年年末,媒体报道我国多地婴幼儿因接种乙肝疫苗死亡,导致我国乙肝疫苗接种率下降了30%,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国每年约新出生100万婴儿,这意味着有将近30万婴儿没有按时接种乙肝疫苗。疫苗是人类对抗病毒的唯一武器,由于担心疫苗引起的不良反应甚至死亡病例,许多家长忧心忡忡,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我国公众对于疫苗等药品质量的信任危机。经媒体曝光后,国家卫计委迅速对“涉事疫苗”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婴儿死亡病例与疫苗质量无关,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婴儿死亡呢?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2012年我国卫生

〔1〕 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

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 2012 年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十点三,而我国新生儿几乎全部都要接种乙肝疫苗,婴儿死亡的原因可能是有很多种,包括自身免疫缺陷等原因,为什么公众和媒体会怀疑是因注射疫苗导致的呢?自 2005 年安徽泗县出现甲肝疫苗事件以来,我国媒体几乎每年都在报道“疑似疫苗导致儿童死亡”的故事,给公众营造了一种对疫苗安全性持恐慌和怀疑态度的舆论氛围,不得不说是疫苗信任危机的帮凶。

媒体究竟对社会信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机制是什么?这是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旨在为人们揭示媒体影响社会信任的客观规律,从而为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信任危机提出解决之道。

第一节 媒体对信任的影响

当代信任研究的先驱、社会学家齐美尔(Simmel)在《货币哲学》中指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综合力量之一。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因为几乎很少有什么关系能够建立在对他人确切的认知之上。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个人经验那样强或更强,则很少有什么关系能够持续下来。”^[2]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集体成员相互协作,就能够产生合力,因而产生“ $1+1>2$ ”的效果;但中国还有一个寓言故事“三个和尚没水喝”,如果集体成员相互猜忌,互相扯皮,就可能产生“ $1+1<2$ ”的效果。信任是社会的黏合剂,而不信任却阻止合作并破坏参与,“信任被破坏达到一定程度,所有的合作性事业必定倾向于失败”。^[3]

普特南(Putnam)通过对意大利的民主治理研究发现,意大利北部和南部在地区政府绩效的显著差异,最终归因于互惠规范、公民参与和社会

[2] 参见[德]齐美尔:《货币哲学》,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3] Warnock G J, *The object of morality*, Methuen, 1971, p. 307.

信任的差异——这三者都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其中，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使得遵守规范的公民共同体能够解决他们的集体行动问题，更好地促进经济繁荣和民主治理。^{〔4〕}

对于信任的影响因素的分析，郑也夫从生物学的角度、历史的角度、经济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原因，但没有涉及媒体的作用；卢曼（Luhmann）、尤斯拉纳（Uslaner）、什托姆普卡（Sztompka）等外国学者分别从各自的视角提出了诸多影响信任的因素，但也都没有涉及媒体的作用。

在此不得不回顾一下媒介效果研究历史上的一个插曲，在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通过对大选期间媒体对选民的影响研究，得出媒体具有“微弱效果”的结论后，郎氏夫妇（Lang & Lang）等许多传播学者都很难接受大众媒体的“微弱效果”的结论，他们认为媒体肯定具有强大的效果，只是还未被人们所发现，并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实际上，媒介效果理论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有大相径庭的观点，既有“魔弹论”，又有“有限效果（或微弱效果）论”，这足以看出媒介效果和影响的复杂性。

那么，媒体究竟是不是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呢？

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媒体报道对社会信任有着重要的影响，媒体成为导致社会信任危机的关键因素。例如，景军通过对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几大城市都流传过的艾滋针刺谣言的传播过程的分析指出：部分新闻媒体持有所谓艾滋病患者一定会报复社会的观点，在公共舆论中营造了一种敌视艾滋病感染者的声音，造成集体的道德恐慌，成为了艾滋谣言传播的关键因素之一，艾滋谣言的根基是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他者化”和社会信任危机。自2001年在天津发生艾滋针刺谣言之后，每一年都有类似的谣言出现，并且愈演愈烈；谣言之所以盛行，说明社会其他人群对艾滋病感染者在经历了道德恐慌之后产生了更大的不信任。^{〔5〕}

〔4〕 Putnam R D,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5〕 景军：“艾滋病谣言的社会渊源：道德恐慌与信任危机”，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罗宾逊(Robinson)是最早进行实证研究媒体对信任影响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发现,电视新闻对于政治新闻的报道往往倾向于展现冲突,特别是对于大选的报道,电视新闻把竞选双方的相互攻讦、无理性表现的一览无遗,损害了公众的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6] 罗宾逊称这一现象为 videomalaise(可译为“电视不适症”)。

国外许多研究都围绕着电视不适症的假设展开,并支持了这一假设。例如,马茨(Mutz)等研究了电视辩论的文明程度与受众信任的关系,发现暴露那些不文明辩论的受众,不太信任国会、政治家和政府。^[7] 卡贝拉(Cappella)等指出,电视媒体倾向于报道竞选活动的豪华场面、竞选策略等毫无实质性的内容,把竞选当成一场体育赛事一样报道,这也会有损公众的信任。^[8]

诺里斯(Norris)提出了“良性循环”(Virtuous Circle)假设,与 videomalaise 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媒体的存在导致更大的政治信任和公民参与。诺里斯研究发现,那些原来政治信任度高的受众会更愿意接触媒体提供的信息,并强化自己的政治信任程度;相反地,那些对政治愤世嫉俗的人会主动地规避任何潜在的影响,忽视媒体的报道;据此,她提出:信任导致更强的媒体接触,更强的媒体接触导致更强的信任程度。^[9] 根据这种观点,更加关心政治、积极参与并持有信任的人,将对新闻给予更多的关注,通过新闻了解政府与政治;更多的知识将导致更大的信任和积极的公民参与,产生一个良性循环,增强民主。相反地,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无视政治新闻,即使他们暴露在政治新闻面前,也会由于他们不信任媒体以及报道内容,从而减少媒体对他们的潜在影响。她举出了一些例证,在1997年的英国大选期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6] Robinson and Michael J, Public Affairs Television and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Malaise: The Case of “The Selling of the Pentagon”,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6, pp. 409 - 432.

[7] Mutz D C, Diana C and Byron R, The New Videomalaise: Effects of Televised Incivility on Political Trust,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9, 2005.

[8] Cappella J N and Kathleen H J, *Spiral of Cynic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 Norris P, *A Virtuous Circ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度和对新闻报道的关注度同时达到高峰。

以上两种观点都出自实证研究,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前者认为媒体破坏社会信任,后者却认为媒体促进社会信任。由此可见,媒体对社会信任影响的复杂性。

除受众的个体因素对媒介效果的影响外,许多学者研究发现,报纸、电视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对信任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效果。在威斯康星州的一项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地报纸对政治的批评较电视媒体更少,研究者通过对受众的调查发现,报纸比电视新闻更能促进政治信任。^[10]

美国发生“9·11”事件之后,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为研究媒体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场域,美国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自2001年秋至2002年夏,电视受众的社会信任度出现下降,而报纸受众的社会信任度出现上升。^[11] 这项研究的发现与威斯康星州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艾弗里(Avery)通过对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一些受众调查和媒介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媒体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媒体的类型:电视新闻会对公众的信任带来负面影响,而报纸新闻会对公众的信任带来正面的影响;其次是受众个体原有的信任度,低信任度的人受媒体影响不大,而高信任度的人更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12]

可见,媒体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并非用简单二元论的“促进作用”或“破坏作用”就能厘清的,媒体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既受到受众因素的制约,同时,媒体自身的因素也会导致产生不同的媒介效果。

过去的研究倾向于从微观的层面,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受众因素、媒

[10] Moy P and Pfau M, *With malice toward all?: The media and public confidence i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0.

[11] Gross K, Aday S and Brewer P R, A panel study of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and social trust after September 11, 2001, in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9, No. 4, 2004.

[12] Avery, James M, Videomalaise or virtuous circle?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s media on political trust,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14, No. 4, 2009.